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教材

历史学田野实践的
理论、方法与案例

温春来
黄国信

◎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教材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 理论、方法与案例

温春来
黄国信

◎ 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 / 温春来, 黄国信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495-9735-2

I. ①历… II. ①温…②黄… III. ①史学—教学研究 IV. ①K0-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86684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南宁市高新区高新三路 1 号 邮政编码: 530007)

开本: 89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40 千字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导 言

温春来 黄国信

在现代学科体系下,一谈到田野,人们自然将其与人类学联系起来。但实际上,历史学也有着悠久的田野传统,史学家们一直努力走向田野,以获得对史料语境的准确理解与把握。近几十年来,历史学与人类学在方法论上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历史学也越来越重视田野工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历史学在保持学科特色的前提下,无论在研究还是教学领域,都在不断强调田野。但是,到目前为止,并未有系统的历史学田野实践教材。本书即是出于此目的一个初步尝试。

中山大学历史学科有着长期的田野实践教学经验,开设有专门课程,并与中山大学岭南文化研究院、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政府一起,共建西樵实践教学基地。这一基地于2013年、2014年分别被批准为广东省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学生们在西樵实践教学过程中所撰写的论文和专著,一些已经公开发表或出版;一些则被地方政府所采纳,为地方文化建设做出

了一定贡献。现在我们拟将多年的教学心得与体会形诸文字,编成教材,既有利于今后的教学,也方便就教于同仁。我们教材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理论与方法的总结;二是结合具体田野点来说明实践教学的实际开展过程;三是同学们在田野实践教学中所取得成果的选集,由此呈现教学成效,并为今后选修此课程的学生提供一个样本。前两个部分汇集于一册,题名《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的理论、方法与案例》,是为方法与实践;第三部分单独成书,题名《西樵历史研究——历史学田野教学成果集》,是为成果展示,已经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5月正式出版。

下面对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进行简要论述。

一、围绕学科特点展开的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

中山大学历史学长期坚持田野实践教学,完全出于本系师生对历史学学科方法的理解。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没有多少直接的、立竿见影的“应用”价值。这对教与学都形成了一种挑战,许多学生可能会因专业知识与实际生活表面上的相距甚远而意兴阑珊。对此,我们可以通过阐述历史学在人类认识中所体现的古今之间的双向影响,以及历史学拓展个人与群体狭隘的经验世界等理论等来消除学生的误解,但到此为止,尚未能很好解决“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所以我们更需要通过实际展示、体验、践行历史学的思维方式,提升学生的认识能力。然而,对于缺乏研究经历的本科生,仅凭课堂上的讲授、在缺乏指导的情况下拼凑完成的作业(往往得不

到仔细批改)和走马观花似的教学考察等,完全不能满足这一要求。我们需要带着学生,到一个具体的田野点,进行封闭式强化训练。每天从早到晚,结合田野调查,发现问题,搜集并解读史料,相互辩难、相互启发,度过一段全天沉浸于学术中的生活。在此过程中,既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同时教师、助教要与学生就研究目标、问题的性质、解决问题的途径、怎样寻找材料、如何解读史料等问题反复研讨。学生的成果出来后,教师还要认真点评。这就是我们心中的历史学“田野实践教学”——一种践行史学思维方式的教學。

为何要选择田野而非图书馆作为实践教学的抓手呢?这固然缘于我们的学术传统,同时与历史学的另一个基本特点不无关联。我们认为,历史学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它关注人作为人的那一面,而且是作为实际生活中的人而非抽象的人的那一面。它重视具体的人或群体的个性,对他们予以关注和理解,体现人的价值、尊严与自由。如果她要阐释某个社会的总体进程,也一定要基于具体的方式而非抽象的原则。职此之故,对人性的深刻把握、对社会的透彻了解,是优秀史家应具备的基本素质。把学生带到田野中去,训练他们去考察一个社区的实际运作,学会如何与人打交道,再结合丰富的史料阅读,他们自然能体会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渗透,从中增长知识与学问,并学习为人处世的智慧。

二、在田野中寻求什么

其实,田野原本就是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在历史学的早期阶

段,田野是历史学的资料来源,历史学家虽然以文献为主,但也常常会辅以相当的实地调查所得,这一点无论是司马迁的《史记》还是希罗多德的《历史》都反映得很清楚。随着历史学的专业化,田野资料的重要性日渐降低,历史学逐渐成为一门局限于图书馆与书斋的学问。现代历史人类学重新走向田野,当然不是向自己童年阶段的简单回归,而是意味着在人类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影响下建立起了全新史观。

简单说来,现代历史学家在田野中寻求的东西主要有:

1. 民间文献。图书馆、档案馆等公藏机构收藏的并非存世的全部历史文献。大量的族谱、碑刻、契约、账本、合同、阉书、宗教礼仪本等散存在民间,离开了这些文献,历史学走向下层就是一句空话。
2. 口碑资料。口耳相传是传承历史的一种方式,它们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对客观历史的一种或真、或假、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的反映;也可以理解为个人或群体的一种不能在真假意义上判定其价值的历史记忆,是多元历史表达中的一种。
3. 人文资料。主要是各种风俗、仪式、服饰、建筑风格、村落布局等等。一场游神活动或许就是乡村社会关系的表达,某种神灵的信仰可能提供了管窥社区历史的窗口,某栋建筑应该就是村落活动的中心,……一切依赖于历史学者的眼光与解读能力。
4. 遗迹遗物。人类遗留下来的诸多反映自身历史的遗迹与遗物,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
5. 自然环境。人类与环境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历史文献对某个特定地区的环境往往仅有只鳞片羽的记载,甚至完全阙

如,这有时会严重影响我们对相关史料的理解,也影响我们对区域历史的重构工作。因为环境中的许多因素具有较长时期的延续性,所以今天的实地调查就显得非常重要。环境有时也会出现沧海桑田的巨变,我们考察巨变的结果,同样有助于我们理解、分析许多历史现象。

6. 参与体验。传统上,一个标准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应该至少在田野点呆上一整年,并辅以后期的补充调查。因为一年通常是某个社区生产与生活的周期,人类学家在此期间与社区居民们共同起居,尽量融入当地人的生活,学会以当地人的视角观察社会,以达致对当地文化更贴切的理解。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历史学的田野工作大都像走马观花,虽然如此,历史学者还是应该尽量去体验当地人的生活,理解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理想的状况是:对于所研究的社区,理解的时候能够融进去,解释的时候能够跳出来。

必须注意的是,走向田野并不意味着对传统文献的忽视。传统史料是历史学的根基,一位优秀史家必须具备政治史与制度史的功底,熟悉各种正史、典章制度,掌握考据、编年等史学看家本领。就历史学者而言,如果在看家本领都非常陌生的情况下就急着走向田野,无疑属于本末倒置,也无法体现出历史学田野调查的特色。

三、在田野中解读文献

我们实践教学的核心是“在田野调查中解读文献”,这一点突出地体现了历史学本位的特色,表明了与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根本差

异。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1. 有历史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理由是文献材料匮乏,而近代社会史研究拥有浩如烟海、难以穷尽的文献资料,因此毋需进入田野。这其实是对田野工作的严重误解。首先,文字并非“历史”的唯一载体,人类社会的“历史”,形诸文字者只是一部分,还有许多体现在仪式、习俗、器物、口碑、空间格局等方面;其次,历史与现实之间往往并非泾渭分明,许多历史延续并融入到现实生活中;第三,即便从文献的角度而言,许多文献保存于民间社会而非公藏机构,并且这些文献与传统文献性质不同,不能相互取代。综上可知,文献材料丰富并不构成漠视田野的充分条件。毫无疑问,局限于图书馆也可以做出一流研究,但我们认为:不同类型的文献(如正史、政书、地方志、族谱、碑刻、契约等等)、口述资料、仪式活动等表达了不同层面、不同角度但却并非全然无关的历史,应同时注重这些不同的历史表达,并将之整合在一起,以期呈现富于立体感的历史。书斋与田野的结合,其魅力令我们无法抗拒。

2. 田野调查补充和丰富了文献的语境,使文献的信息趋于完整,研究者由此可以达致对文献更妥贴的理解。停留在书斋里研究历史,会造成对历史的许多误读。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国内南方某著名历史名胜,因“某某洞”而名,但该名胜所在地并无山洞,该景点的管理人员遂在其建筑物的后山上,人工开凿一“山洞”,以使该景点“名副其实”。但我们进入该历史名胜所在地后,发现其地形是四周环山的一个小盆地。历史上,这样的地形,在广大的南方,一般被名为‘洞’或‘峒’。而在南方山区的史料中,关于‘洞’的记载,描述

的基本上是此种地形。可见,该名胜开凿山洞,实为画蛇添足之败笔。

关于田野与文献的关系,陈春声有过一段比较理论化的说明,在此不惮繁琐,征引如下:“置身于历史人物活动和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的自然和人文场景之中,切身感受地方的风俗民情,了解传统社会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场景和记忆中阅读文献,自然而然地就加深和改变了对历史记载的理解。在调查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一种自觉,即他们在‘口述资料’中发现的历史不会比官修的史书更接近‘事实真相’,百姓的‘历史记忆’表达的常常是他们对现实生活的历史背景的解释,而不是历史事实本身,但在那样的场景之中,常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过去如何被现在创造出来,理解同样也是作为‘历史记忆’资料的史书,其真正的意义所在及其各种可能的‘转换’。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也可以更深切地理解过去的建构如何用于解释现在,结合实地调查,从不同地区移民、拓殖、身份与族群关系等方面重新审视具体地域中‘地方性知识’与‘区域文化’被创造与传播的机制,就会发现,许多所谓‘地方性知识’都是在用对过去的建构来解释现在的地域政治与社会文化关系。”^①

3. 我们强调在田野中解读文献,还因为,乡民的某些生活常识,对于从书斋里走出来的学者来说,很可能就是石破天惊的学术新发现。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史教科书关于中国经济史的叙述,受古典经济学理论影响极深。古典经济学关于市场兴起,有一套极富逻辑

^① 陈春声:《走向历史现场》,《读书》2006年第9期。

美感的理论。它指出:由于生产发展,产品剩余,人们开始有了交换的需要。因此,在交通要道等人口众多的场所,就形成了市场。但是,根据厦门大学刘永华教授的田野经验,^①以及我们自己进入乡村的考察,发现这一理论至少还存在一个中间环节没有落实,这个环节就是,这个“自发形成”的市场,是有交易欲望的人们自动聚集形成的,还是有某些力量组织建造起来的?有一次,我们走到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民乐社区延陵村,走进其中的吴氏祠堂,发现墙壁上贴着该祠堂的收支明细,显示该祠堂大概90%以上的收入来自市场铺租。这就表明,该祠堂控制了当地的一个市场。根据访谈,我们发现果不其然,该市场是由该祠堂投资兴建的。类似的故事,我们还在广东韶关乐昌县廊田镇的村子里听到过,不过更为详细,据当地人说:清代中后期,当地盛产粮食,其中一个家族发现商机,就择地建起了市场,出租商铺,并管理该市场。这些故事说明,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场的形成过程,并非由古典经济学用“自发”一词一笔带过就可以说得清楚。这一“自发”当中,有具体的力量因为具体的利益而参与其中,并形成此后市场运作的基本架构。这个例子说明,市场的具体形成过程对于乡民来说,就是他们的生活常识,但对于中国古代市场形成的理论来说,却是一个关于其运作环节的重大发现了。这样的发现,在书斋里是比较难得到的。

^① 参见刘永华《墟市、宗族与地方政治——以明代至民国时期闽西四保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四、推论性的解读方法与问题意识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以在田野中解读文献为核心,将各种类型的文献(如正史、实录、政书、档案、方志、族谱、契约、碑刻、科仪书等)、口碑、风俗、礼仪、信仰、建筑、环境等各种资料整合在一起,重构出富于立体感和整体性的“历史”,并藉由此“历史”回应历史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些问题。在此过程中,推论性地解读各种资料是我们的基本原则。

何谓推论性地解读?我们可以从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科林武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所强烈批评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说起。这种历史学家摘录和拼凑各种史料,稍好者尚能区分真、伪文献(更次者当然是真伪莫辨),将所谓真文献视为权威,对之进行摘抄、编排,必要时加以翻译,并在自己的历史著作中重新铸成他觉得是合适的样式。^①这种历史学本质上是一种缺乏灵魂的文献汇编,类似于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所讲的作为假历史之一的“语文性的历史学”。^②科林武德又特别提到:“考古学运动,则是完全与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原则相敌对的。”^③科氏的意思是,同文献材料

① 参见科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357—359页。

② 参见克罗齐著,傅任敢译《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5—21页。

③ 科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第361页。

不同,考古资料诸如器物、遗迹等不会将历史叙述给你听,它就像一些证据,你要透过证据间接地揭示出没有直接叙述以及无法观察到的人类行为。

循着科氏的思路,历史学家理应从图书馆和田野中搜集的各类文献材料与非文献材料当作证据。历史学的目的不是指出证据告诉我们什么,而是要对各种证据提问,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各种有根据的推论,从而揭示出证据不会告诉我们的历史过程来。这就像一位侦探断案,张三与李四的证词、一把沾满血的匕首、雨夜的环境、地上的足迹等等都不会告诉他谁是凶手,但高明的侦探能够从这些林林总总的证据中发现谁是罪犯或破案的正确方向。从这个角度来讲,史料无所谓真假,我们不应学剪刀加浆糊式的历史学家对假材料置之不理,因为没有错误的史料,只有错误的历史学家。试想,一段故意作伪的证词难道对判案的法官没有用吗?好的历史学家都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的:陈寅恪先生就是从伪造的唐皇室世系入手,发千载之未覆,揭示出北魏至唐代间的若干重要历史,点明了种族与文化这一理解唐代历史的关键。^①

推论性解读的方法不是等到“搜齐”材料才开始,而是在历史学者甫一接触材料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举个例子,我们进入一个村落,看了几块碑,同村里老人聊了会儿天,查看了一下周边环境(如河流走向、是否是干旱气候等)与建筑布局。也许前后只花了一小时,但我们就是要根据这一小时内所观察到的证据,推测出这个

^① 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

村落的历史。这个推测真假兼半甚或全属错误,但却充满了积极意义。因为史学的思维应该是一接触史料就自然开始,而非将搜集材料与思考截然分开。在很大程度上,构成某项研究的材料,是与思考的深度与广度密切相关的。许多初学者抱怨材料缺乏,其实是他们对那些零零星星、蛛丝马迹般的宝贵信息不敏感。一旦思考深入,便可逐渐左右逢源,待到后来,触目尽是可用史料,这就是融会贯通的境界。因此,无需惧怕在最初材料占有较少时所做出的不尽正确的推论,它们是研究的导引,而非最终成果。如果真要研究此村落,接下来可能要花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一边不断在公藏机构和田野中丰富各种材料,一边不断根据新加进来的资料修正、完善乃至完全推翻前面的推测,增加此前忽略的方面。等到材料大致搜齐并研读完毕,研究也就初步成熟了。必须注意的是:我们不能只研读符合自己推论的材料,而是要研读所有搜集到的材料(如果有前人做过相关研究,那我们在材料的占有上要尽可能超越前人,至少也得与前人相当)。历史学的真实性就在于各种材料间的融会贯通,最终研究成果应该和既有的各种材料不构成矛盾,或虽构成矛盾但你能够有说服力地进行解释。

其实,这种积极的推论性解读历史学田野调查的专利,一位只在图书馆研读资料的历史学者,同样需要从只占有很少材料的时候就开始分析推断,认为被动地读完所有资料“历史”就会自动呈现出来的人,最终可能将所获甚少甚至一无所获。

推论性地揭示出历史过程并非历史研究的全部,史学研究者应该能够进而回应历史学乃至其它学科的问题。人类学的功夫就体

现在通过一个小地点的特殊性知识,挑战人们以为不言而喻的普遍性结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学习。历史学在这个方面其实已经有不少典范性的作品,例如科大卫和刘志伟关于珠江三角洲宗族的研究成果,对我们理解中国传统王朝国家的整合机制就非常具有启发性,^①我们前面关于古代市场如何形成的说明也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五、一些说明

近年来,我们坚持历史学本位,在历史学教学中,要求学生有组织地全部走向历史现场,以文献解读为核心,收集史料、开展访谈、考察环境、了解仪式,以达致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入理解。毋庸讳言,这一方法往往被贴上“历史人类学”的标签。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历史人类学”并非从西方学术界移植而来。它既具有中国的学术传统(主要是以梁方仲与傅衣凌为代表的中国社会经济史传统),同时又是积极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产物。我系刘志伟、陈春声,厦门大学郑振满,以及海外的科大卫(David Faure)、萧凤霞(Helen Siu)、陈其南、蔡志祥等学者为这种学术取向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因地利之故,我们训练学生的田野主要在珠江三角洲。在田野中,我们停留最多的地方无疑是祠堂、庙宇,最能吸引大家目光的自然是期不期而遇的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因此,有的朋友以略带戏谑的口吻称我们是“进村找庙”、“进庙看碑”。一些初学者因为研究

^① 参见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地点没有庙宇和祠堂,庙宇和祠堂里面没有碑刻,或者在村民家中找不到族谱等而深感困惑。其实,我们关于“田野可以为我们提供什么”的分析表明:“历史人类学”并不意味着一项研究必须以村落(或某个小的社区)或至少要有村落的个案为基础,也不意味着要有族谱、碑刻、契约等民间文献,更不是将存在较多的祠堂、庙宇等作为选择研究区域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庙宇、祠堂、碑刻、族谱等民间文献在“历史人类学”里显得重要,那只是因为:1.这种取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最初是在闽、粤二省进行的实践,而闽粤地区恰好有许多庙宇、祠堂和民间文献;2.在训练学生方面,存在这类资料的地区能够让学生在短时间内体会到上述研究取向;3.对历史研究而言,选择有较多文献的地区做研究比较容易上手,也更具可操作性。

我们应该明白,历史学研究的是人类群体(社会)或社会意义上的个人(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并不存在纯粹的个人英雄史)。在闽粤等地区,祠堂和庙宇正好是群体活动的主要场所,是村落等社区得以组织、运转的枢纽,其重要性由此可见。然而研究者的目标应该是发现这类枢纽,而不是刻意去寻找祠堂和庙宇。若一味固执于后者,有时难免发现研究无法开展,即便可以开展,也可能会掉入闽粤地区的模式而掩盖所研究地域自身的特色。事实上,近十年来,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类学作品,都是在庙宇、祠堂、族谱等不那么丰富的地区展开的,有的作品甚至没有村落的个案,带有政治史与制度史的色彩。恰恰是这些因素,使得上述作品显得别具一格。质言之,重要的是研究取向,而不是那些画地为牢的要素。

六、本书的基本框架

前面我们已交待了本书的缘起,并对历史学田野和田野实践教学做了概括性说明。接下来的一、二、三讲,我们将分专题介绍田野实践教学中所要处理的主要文献材料,包括在田野中经常会遇到的族谱、碑刻、契约。正史、政书、方志、档案等是基本的传统史料,对走向田野的历史学者而言,它们同样极其重要,但一般史料学课程对它们会有较多介绍,因此本书不再专门分析。非文字材料,主要有口碑和信仰仪式,是四、五两讲的主要内容。环境、空间格局等等,同样是我们需要考虑的,但不再独立介绍。

以上内容构成本书的上编——理论与方法。本书的下编——实践,则围绕国家大学生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广东省大学生校外教学案例教学基地——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田野点来说明教学的实际展开过程。读者可以发现,我们在上编中没有专门进行分析的政书、方志等传统文献,以及环境、空间格局等非文字材料,在教学过程中并没有被忽视。

温春来: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

黄国信:中山大学历史系、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